

勞動者的日常生活美學

——王安憶小說中的市民精神

● 詹玲、王姝

1978年以來的改革開放是一場以城市化為目標的經濟發展運動。在過去的三十多年裏，城市化以突飛猛進的速度向前發展，在經濟繁榮的同時也帶來諸多問題，如功利主義、拜金主義及階層衝突等。這些問題突出地呈現在原市民底層和大批進城農民工組成的新市民底層當中。尤其是後者，由於生活經驗和價值觀差異、經濟地位低下等因素，使他們往往在城市難獲身份認同，與此相關的社會衝突也悄然增多。

新的時代問題使作為城市凝聚力的城市精神面臨新變革。在以城市為主體的經濟政治取代了以農村為主體的革命政治的新時代，甚麼樣的城市精神能夠在城鄉之間建構一種新的社會認同？甚麼樣的城市精神能夠締造超越現代性的和諧之城？甚麼樣的城市精神能夠給予市民生活（包括進城鄉下人這類新市民的生活）正確的價值導向？

文學家在摹寫城鄉社會時代圖景的同時，亦在緊張思考着這些問題。

由於不同作家自身經驗不同，價值立場不一，對上述問題的思考也就各有差異。作為一名堅持從日常經驗出發構築市民社會生活的作家，王安憶的小說始終沿着思索城市精神的道路前行。從最初無意識地觸及勞動與生命價值的體現關係，到尋根時期將勞動作為個體生命力的精神勃發，再到1990年代以後有意識地從個體勞動中挖掘日常生活美學精神、構築城市生活價值體系，繼而在新世紀把價值體系立足於進城鄉下人這一龐大的新市民群體，建立新的城鄉社會價值認同，王安憶的每一步，都有着自身經驗的痕迹。這使她的創作既能超越一般的理念構架，尋找到生活的實在，又有着不可避免的局限性。

一 《流逝》：以勞動為根本的價值體系建構之始

1982年5月，王安憶完成了中篇小說《流逝》。這篇小說在發表初期引

在以城市為主體的經濟政治取代了以農村為主體的革命政治的新時代，甚麼樣的城市精神能夠在城鄉之間建構一種新的社會認同？甚麼樣的城市精神能夠締造超越現代性的和諧之城？

*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項目10CZW015的階段性成果，浙江省之江青年社科學者資助成果。

把勞動作為自我實現的需要，這一思想已根深蒂固於王安憶。因而，當這種價值觀內化到文本之中時，表現出來的不是概念的疊加，而是屬於她個人的、從經驗出發的價值思考。

起了短暫重視後，由於作者成功轉向尋根文學創作，而漸失評論關注度。然而，考察王近三十年的創作軌迹便會發現，《流逝》作為她最初無意識地觸碰市民精神思考的作品，其價值立場在後來的作品中一直被堅持並深化。這使我們有必要把這部作品放在最前面，做一個溯源性的梳理。

《流逝》選擇了彼時最流行的文革時代背景，但只把文革作為一場家庭變故的引源；其實，沒有文革，這場家庭變故也可能因其他原因而發生。小說的敘事重心放在了以生存為核心的勞動精神思考上。保姆阿寶阿姨曾如此形容歐陽端麗家人：「你們家的人呢不是長的，是用金子鑄的。」^①王安憶忍不住在後面跟了一句點評：「倒是貴重，卻沒有生命力。」^②甚麼才能激發人的生命力？王安憶給出的答案是通過勞動。文革的抄家，使端麗一家的生活狀態從富有舒適淪落到困窘艱苦。從來不用為生計操心的少奶奶端麗，不得不挑起家庭重擔，用勞動換取生存的基本需要。而一旦端麗真正走入了勞動生活，她的生命力也就被激發出來了。王寫道：「她感到自己的力量，這股力量在過去的三十八年裏似乎一直沉睡著，現在醒來了。這力量使她勇敢了許多。」^③

勞動復蘇了歐陽端麗沉睡的生命力，使她獲得了自尊和勇氣，並嘗到了生活甜酸苦辣俱全的滋味。馬克思將工作設想為人的根本需要，把勞動或工作視為日常活動。在馬克思設想的未來中，人需要工作，因為「作為自由的個體，他不工作就無法再生產自身」^④。端麗在文本中的形象，正體現了馬克思的這一價值觀念。文革結束，家境好轉，端麗不用再上班了，但「當她重新習慣了這一切的時

候，她的新生感卻慢慢兒地消失盡了。她不再感到重新開始生活的幸福」^⑤，沒有了勞動，生活便失去了「為我們存在」的意義。匈牙利哲學家赫勒(Agnes Heller)指出，「就日常生活批判的主題，它所追求的是有意義的生活，而不是通常意義的幸福」，「幸福是日常生活中『有限的成就』意義上的『為我們存在』」，「有意義的生活是一個以通過持續的新挑戰和衝突的發展前景為特徵的開放世界中日常生活的『為我們存在』」^⑥。當端麗不再需要通過工作來獲取家庭生存需要的時候，她放棄的不僅是勞動能力，更是對自己給定狀態的超越，惆悵和憂鬱皆因無法再尋到自身存在價值而來。

通過《流逝》中歐陽端麗的形象塑造，王安憶試圖構建日常生活新的價值體系——一種把工作或勞動視為創造和再創造個人生活的價值體系。這種價值體系的生成，與作家個人的生命體驗有着密不可分的聯繫。王曾如此記下她的寫作感悟：「寫小說就是這樣，……拿起筆，在空白的筆記本上寫下一行一行字，……日以繼日。要是有一點動搖和猶疑，一切就將不復存在。」^⑦回看《流逝》中端麗的小女兒咪咪「在日頭下，流着汗，一小步一小步地接近目標，獲得果實」的生活態度^⑧，與王何其相似！把勞動作為自我實現的需要，這一思想已根深蒂固於王安憶——它並非一種抽象的理念，生活實際就是如此。因而，當這種價值觀內化到文本之中時，表現出來的不是概念的疊加，而是屬於她個人的、從經驗出發的價值思考。

在1950年代的新中國，勞動價值觀從政治教育、文學藝術、經濟生產等方方面面深植國民思想，成為一代

人的價值體系根本。然而，集體主義價值觀對個人性的抹殺，使勞動並非作為個人生存和發展的手段，而是被淹沒在國家政治的宏大話語中，成為虛空高蹈的浪漫理想。1970年代末「撥亂反正」後，勞動作為個人生存和發展的手段再次被提出。每個人憑藉勞動從社會財富的分配中獲得相應的份額。在《流逝》中作家強調勞動之於自我實現的重要意義，既是從個人生命體驗出發的獨立思考，也與新時代的政治價值體系吻合一致。但即便如此，我們仍需要指出的是，這一觀點並非在當代現實生活中適用於每一個體。

馬克思指出，隨着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工人被剝奪了生產對象和生產手段，這些作為異己的社會力量與他們產生對立後，工作過程就會愈來愈異化，勞動就成為外在的東西，不再是需要的滿足。要鏟除這種勞動異化現象，並非靠提高勞動水平，而是取決於社會總體的變革^⑨。因此，我們只能說，王安憶通過歐陽端麗，以及後來一些文本中透過勞動者的形象所表達的價值觀，是她從個人經驗出發的真實，對於社會現實中的大多數工作個體而言，還是一種理想生活狀態，需要整個社會不斷共同努力，才能有機會實現。

二 《流水三十章》：勞動經驗差異下的城鄉對立

循着《流逝》體現的勞動價值觀，1986年，王安憶寫下了長篇知青題材小說《流水三十章》。這篇小說寫於尋根文學潮流興起之時，於是，尋找個

體生命的自然活力，成為作品的敘事目的。由於敘事對象分立城鄉兩端，王因而無意識地觸碰了城鄉關係這一改革時代社會變遷中的主要問題。

與《流逝》中文革導致家道中落，將歐陽端麗逼上了生存的抗爭之路一樣，《流水三十章》裏「下鄉」的號令，使一群上海城市少年背井離鄉，開始了在農村的自我生存之路。這些城市少年剛到四川金剛嘴時，讓村人充滿了好奇，農村男孩拽子「每日堅持不懈地到學生們的屋裏守着」^⑩，就是為了窺探這群跟自己不一樣的人。當他發現原來那群城市少年跟自己一樣吃飯穿衣睡覺，一樣為生存爭吵謾罵後，「學生們身上所籠罩的一層幃幕，漸漸地被他拉扯了下來，拉扯下來的同時，在他們身後的那一個遙不可及的城市的嚴密的幃幕似乎也開始移動了。其實，也就是那麼一回事，拽子心裏想着」^⑪。消弭了因城鄉陌生經驗而產生的差異感，回到生活的原本，讓拽子感到了驕傲，因為他擁有比城市少年更強的生命力——無論是性的覺醒上還是勞動能力的強悍上。魏源生、齊小蘭和張達宏等城市孩子，只能用尋找父母庇佑或私性衛護自己的方式生存，與心中擁有「為人立世與生存繁衍的兩大學問」^⑫的農村男孩相比，他們的不健全顯而易見。自然賦予他們的生命力在鋼筋水泥的城市保護下，褪卻了原始的華彩。

然而，小說中卻有個張達玲。她在冷漠的城市家庭生活裏練就的堅強韌性，到了農村勞動生活中，便內化為向自然汲取生命能量的本能，這使她與那些生命力脆弱的城市孩子迥然不同，她的生命力在農村勞作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肆意張揚。她申請「放大

《流水三十章》寫於尋根文學潮流興起之時，於是尋找個體生命的自然活力，成為作品的敘事目的。由於敘事對象分立城鄉兩端，王安憶因而無意識地觸碰了城鄉關係這一改革時代社會變遷中的主要問題。

刀」，和男性一樣勞動。勞動的快感使她「覺着了一股狂喜」，享受着「從未有過的幸福」^⑩。來自城市的張達玲、來自農村的拽子，都因為擁有同樣的自然生命力而超越了城鄉表層的衝突緊張，達成了內在的人性平等。城與鄉之間因而就有了價值認同的可能。

可以肯定的是，這一時期的王安憶，並沒有以勞動者生命精神來尋求城鄉價值認同的想法，相反，對立是她重點表現的城鄉關係。1980至1990年代初期，王寫下了不少涉及城鄉關係的作品，如《車往皇藏峪》(1982)、《窗前搭起腳手架》(1983)、《悲慟之地》(1988)、《叔叔的故事》(1990)等，都是以城鄉隔膜為中心，呈現城鄉對立的緊張衝突。如《叔叔的故事》刻畫在城裏的叔叔與鄉下來的兒子之間近乎絕望的情感廝殺；《悲慟之地》更是把鄉下人進入城市的每一步，都處理成經驗碰撞的疼痛，並以劉德生被目光逼上樓頂墜落身亡作為鄉下人進城的悲情結局。

然而，與1980年代以城市作為現代文明的象徵來構建城鄉關係的諸多作品不同，儘管王安憶筆下的城鄉關係也是對立的，但這種對立並非基於線性文明發展的外部層面，而是出現在生活經驗不同的內部層面。脫離了現代與前現代的預設價值觀，城市不因其先進、文明而有了俯視鄉村的優越性；鄉村也不因其落後、愚昧而變得低下、卑賤，它們之間是一種平等的對話關係，造成彼此隔膜的只是生活經驗的不同和價值觀的不同。一旦尋求到了普適的經驗或價值觀，城鄉就會真正互融共進。例如《車往皇藏峪》裏婆媳問題的討論，讓城裏女工與鄉下農婦找到了共同語言；互助的

人情也打動了高傲的藝術家，與女工達成了和解。《流水三十章》更是用從勞動出發的生命美學精神聯結了城鄉內在的人性價值。

只不過這樣的價值觀還沉澱在作家的經驗中，一些時候會無意識地冒出來，散落在文本裏，未有清晰地加以提煉。直到進入二十一世紀，王安憶才在《富萍》(2000)、《上種紅菱下種藕》(2002)等作品裏有了較為明澈的認識。在整個1990年代，王努力做的，是從日常生活經驗出發，把時代更迭下城市發展中的價值觀問題呈示出來。1995年發表的《長恨歌》，就是這樣的一部作品。

三 《長恨歌》：浮華都市下的日常生活實在

王安憶的長篇小說《長恨歌》三部中，第一部被關注得最多，因為懷舊色彩和海派特徵最為明顯。但正如王安憶自己所言，「小說的第一部應是不盡如人意」，「重要的情節是發生在第三部，王琦瑤和她的下一輩人邂逅。是第三部裏的情節決定我寫這個小說」^⑪。而要了解第三部，第二部是一個重要的過渡。

第一部中，弄堂女兒王琦瑤以接觸片廠為起點，從「滬上淑媛」到「上海小姐」，以貼心的市井生活氣征服了浮華的都市摩登色，贏得了軍政權貴李主任的心。待到李主任飛機失事，王琦瑤從鄔橋走出，便進入第二部的新中國時代。儘管革命沒能用暴力徹底摧毀王琦瑤一輩人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但卻掃除了新一代人對他們的精神認同。而當革命用來自鄉土

與1980年代以城市作為現代文明的象徵來構建城鄉關係的諸多作品不同，儘管王安憶筆下的城鄉關係也是對立的，但這種對立並非基於線性文明發展的外部層面，而是出現在生活經驗不同的內部層面。

的質樸、粗俗，在新一代的頭腦裏蕩滌了舊上海的摩登洋場氣息後，還沒來得及調整好革命時代的價值觀以適應城市發展的需要，便因走向了極端而遭遇終止。

全球化時代以經濟為中心的改革發展，又用政治強力如同當初洗清舊上海色調一樣，大力掃除了革命鄉村暴力滲入都市的東西。原初的都市文化未清理乾淨，現有的革命價值觀遭遇批判，新的時代發展又已到來。1980年代的上海城市，其實處於一個價值真空地帶。於是，就出現了王琦瑤女兒薇薇這樣一代失卻價值準則的新城市人。他們沒有成形的價值觀可供堅信，只能一招一式「幾乎全是跟着時代走的，甚至還有點跟着起哄」^⑤。因為摒棄了王琦瑤的城市價值觀，所以薇薇對王琦瑤充滿不屑，但又因找不到自己的價值體系，只好不時回過頭來倚靠。

與薇薇不同，其朋友張永紅與長腳自覺地把王琦瑤看作一種象徵。這兩個人都是出身於最為底層的上海貧民區。處於邊緣地帶，他們對都市中心有着本能的嚮往，拼命向時尚前沿靠攏：一個已經達到時尚中的獨特境界，另一個則過着帶有國際化性質的混社會生活。但即便如此，他們達到的也只能是表層——這座城市在改革風潮下迅速全球化、國際化的時尚表層，他們仍處於價值的真空中，沒有尋到自己的根系。因此，他們才一見如故似地被王琦瑤吸引，相見恨晚。王琦瑤身上的城市精神，「攜着夢巴黎的香水味和白蘭花的氣息」^⑥，這些氣息不管超凡脫俗還是平實俗氣，都是實實在在的。王琦瑤的生命力，體現在逼仄的城市空間中堅韌的生活。

這種生活的實在性，在出身城市底層的張永紅與長腳那裏，本來就有。無論是充滿皮硝氣還是簡陋逼仄，都是城市心子的氣息，踏實質樸、世俗日常的氣息。這種氣息與王琦瑤的精緻秀麗雖不同，卻也是一種實在的氣息。他們還有更多其他的氣息，混雜在一起，共同組成了這座城市的多樣生活，鑄就了它的多元精神。而張永紅和長腳卻以繁華錦繡為目標，捨棄了自我生活的實在，奔向了王琦瑤。這使他們用王琦瑤來捕捉城市精神的實在時，看不到王琦瑤為人打針，在工場間鉤毛線活的情景，看不到她的錙銖必較、苦心盤算，只看到「披着霓虹燈的霞帔」^⑦，以及東西南北中都可看到風景的城市魅力。錯把光華和錦繡當做實在，這就使他們提煉出的所謂「生活本質」，並非踏踏實實的生活精神，仍是浮華的摩登色。而愈是從王琦瑤身上追尋切膚可感的虛幻如夢，愈是遠離了生活真正的實在。所以，注定長腳無法經受金錢的誘惑，最終走向鋌而走險、鑄下大錯的結局。

從這樣的角度解讀《長恨歌》，我們便看到了小說中市民精神思考的閃光點。新的時代開始了，每個人都在尋求自我前進的道路，渴求物質生活的提升，渴求精神生活的改變，這些都無可非議。但問題在於，當底層民眾尋找自己的上升之路時，他們把甚麼作為追求的道路？是追求表面的繁華還是追求本質的實在？以割斷自己生活血脈的方式去追求城市的時尚摩登，追尋到的永遠只是模式化、標準化的現代表象，缺乏豐富的精神內涵。這個問題在鄉下人進城規模日益增大的時候，變得愈來愈重要。

新的時代開始了，每個人都在尋求自我前進的道路，渴求物質生活的提升，渴求精神生活的改變，這些都無可非議。但問題在於當底層民眾尋找自己的上升之路時，他們把甚麼作為追求的道路？

相較本身已處於城市中的底層市民，多數以打工為目的的進城鄉下人，由於缺乏社會關係、存在經驗隔膜等諸多因素，處於底層中的底層，他們不僅失卻了話語權力，更失卻了身份認同。獲得身份認同的渴望，使他們往往比底層市民更自覺、更堅定地斬除自己的生活血脈，把城市表面的光鮮亮麗作為追求的目標。以否定自我出身的方式來獲取城市認同，其結果是城市被永遠地他者化。

處於城市邊緣地帶，應該建構怎樣的自我認同？創作於二十一世紀之初的《富萍》，延續了王安憶的思考。

四 《富萍》：文學理想中的市民精神重構

王安憶於2000年發表的長篇小說《富萍》，講述的都市生活幾乎全是外來者的：有在鬧市中心做保姆的，有從鄉下出來浦東做手藝人的，有在閘北搖垃圾船的，還有梅家橋棚戶區裏操持各種拾荒派生出的營生的。這些人一代代進入上海，早的一代如李天華奶奶、戚師傅，已經融入城市內部，「染上了城市市民的脾氣」，「要比那些年輕人更熟悉這城市」^⑩；晚的像富萍，才剛剛進入這座城市，在城市邊緣鋪開自己的未來。

如何書寫這些進城鄉下人？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中，這批人的形象有兩種：一種是啟蒙現代性價值觀下等待先進文明改造的城市他者，一種是社會主義革命文化價值觀下進駐城市的工農新主人。仔細閱讀《富萍》，便會發現文本中的城市外來者形象與

上述兩種形象都不同。無論作為城市的他者或是主人，前兩種進城鄉下人的生活圖景都是被放在城市生活外部來展開的，他們遠離市民群體，或作為城市的過客在旅館、商店稍作逗留，或自成小團體生活，或把工廠車間作為城市生活主體，無法觸摸到城市跳動的生活脈搏，身份認同自然無從確立。

《富萍》的不同之處在於，文本中的女主人公富萍，是被放在市民生活內部書寫的。富萍剛進入城市不久就找到了自己與城市相通的精神：鄉下人在水晶宮似的街道底下過着勞動和吃飯的生活。然而，「那些摩登的男女，在富萍看來，好看是好看，卻是不大真實，好像電影和戲裏的人物。櫥窗裏華麗的衣物，也不大真實」^⑪，而那些伸着手臂，一下一下地扯布的店員、接錢遞貨的煙紙店老闆娘，以及踏縫紉機做活的姑娘，「使她接近了這條繁華的街道，消除了一點隔膜」^⑫。把生活還原到最基本的生存層面，幕布下的底子都是食色兩樣。這是城市市民生活最實際、最根本的內涵，同時也是人類生活最實際、最根本的內涵，是超越城鄉經驗差異、國際經驗差異的同質生活。由此，王安憶成功實現了對以城市浮華、時尚為標準的現代性批判，建構起基於生活根本的城市現代性的追尋，同時也為剛進入城市的鄉下人尋到了親近城市、了解城市，獲取城市精神認同的鑰匙。

依靠勞動吃飯的生活，使這群進城鄉下人建立起屬於自己的驕傲與自尊。王安憶由衷地讚歎道：「他們誠實地勞動，掙來衣食，沒有一分錢不是用汗水換來的。所以，在這些蕪雜

王安憶成功實現了對以城市浮華、時尚為標準的現代性批判，建構起基於生活根本的城市現代性的追尋，同時也為剛進入城市的鄉下人尋到了親近城市、了解城市，獲取城市精神認同的鑰匙。

瑣碎的營生下面，掩着一股踏實、健康、自尊自足的勁頭。它們從各種細節中流露出來。」^②這段話顯示了作者鮮明的價值觀和人性觀，即把勞動視為自我實現的需要，讚頌勞動者的日常生活美學。這又回到了《流逝》中的價值立場。當這種價值立場擴大到城鄉之間，就有了新的意義——作者從日常生活層面建構進城鄉下人的精神世界，並自覺地把他們納入到市民生活中，從而拓寬了《流逝》時期在城市原居民生活內部建構的市民精神。

把擁有物質財富視為獲取個人自尊精神的籌碼之一，強調物質對於人的精神的重要性，這是一種實在的個人主義，既尊重勞動本身，又注重物質生活的追求，把理想與現實緊密聯繫起來，腳踏實地為自我生活的改善而努力。這是改革時代所呼喚的市民精神，它超越了以貧富論貴賤的物質至上價值觀和凌空高蹈的理想虛空，用保證個人精神獨立價值的方式構建起市民精神認同體系，把進城鄉下人作為城市的組成部分來看待，肯定他們積極向上、追求更美好的現實生活的努力，從而使城市精神擁有了更為包容、廣闊且前瞻性的發展空間。

當然，我們在肯定這種城市精神對當下城鄉關係建構的重要意義的同時，也必須回到《流逝》中所提到的問題，承認這種以勞動自我實現為價值觀的城市精神，需要在逐漸消除勞動的異化意識之後才有可能實現。當民眾尚處於為謀生而勞動的階段時，工作成為日常生活的無機部分，並不具有超越日常性的價值。因此，《富萍》中那些為生存而打拼的進城鄉下人，到底有多少能擁有王安憶這樣的把勞動作為自我實現的意識，是很值得懷疑的。

從這方面來講，作家筆下超越城鄉對立的市民精神構建有一種理想色彩。但文學作為時代變革的鏡子，除卻折射出社會變遷中的各種現象，更要對這些現象、問題展開思考，並將現象及思考從審美層面提煉、凝縮，回到人的本體，張揚人的本質力量中最優秀的部分，牽引時代社會不斷走向文明的新高度。文學寫作的人文價值和理想精神就在於此。

註釋

①②③④⑤ 王安憶：〈流逝〉，《鐘山》，1982年第6期，頁15；15；26；43-44；45。

④ 引自赫勒(Agnes Heller)著，衣俊卿譯：《日常生活》(重慶：重慶出版社，2010)，頁70。

⑤ 赫勒：《日常生活》，頁19。

⑦ 王安憶：〈後記〉，載《遍地梟雄》(上海：文匯出版社，2005)，頁246。

⑨ 參見馬克思(Karl Marx)著，劉丕坤譯：《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頁47-48。

⑩⑪⑫⑬ 王安憶：〈流水三十章〉，《小說界》，1988年第2期，頁119；119；146；122。

⑭ 王安憶：《〈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之九——從《金融家》到《長恨歌》》，《文匯報》，2008年3月3日，第11版。

⑮⑯⑰ 王安憶：〈長恨歌〉，《鐘山》，1995年第4期，頁110；131；133。

⑱⑲⑳㉑ 王安憶：〈富萍〉，《收穫》，2000年第4期，頁153；159；159；202。

我們在肯定這種城市精神對當下城鄉關係建構的重要意義的同時，也必須回到《流逝》中所提到的問題，承認這種以勞動自我實現為價值觀的城市精神，需要在逐漸消除勞動的異化意識之後才有可能實現。

詹玲 復旦大學中文系博士後，杭州師範大學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所副教授。

王姝 浙江工業大學之江學院人文分院副教授